

流浪者



0257/27

流 浪 者

周 良 沛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9342

光明日报出版社

1019342

流 浪 者

周良沛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首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2 印张 125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800册

统一书号：10263·013 定价：0.85元

自序

至今，我还相信：才华横溢的诗人，是可以将他生活的感受、人生的体验，全都化为诗的；可是，散文今日的繁荣、发展，并不是世界上缺少有才华的诗人之故；而诗集出版、发行的困难常使诗人寂寞，由诗引起的争论又使诗坛热闹，更非散文繁荣的活力。

不仅是诗，而是整个文学，以至于音乐、绘画作品，当它在艺术上熠熠闪光时，就是文艺家将他所表现的生活和个人的感受溶入了一个诗的境界。这是诗的光荣。但是，如果它们不是运用各自的语言与形式的特点，而是以对自身特点的否定，向诗靠拢才有一个“诗”的境界，那么，诗就成了伐尽绿树的土壤，流失了水土的沙漠。是光荣的悲剧。

经诗人化为诗的生活，是诗人需要表达的感受只能成为诗；

作家化为散文的生活，同样是作家寻到、需要以散文来表达自己感受的、最恰当的艺术形式；

诗，可以追求语言的自然、朴素而具有一种“散文美”，但诗，还得是诗；

散文，完全应该以表达出诗的境界作为重要的艺术追求，但散文，虽然不是拿出写散文的架子来

写的散文，还得是散文。

诗，有人说主要是抒情的，那么，散文、音乐等等更不排斥抒情。但是，它们一致的抒情，绝不能作为放弃各自特点的艺术统一。为抒情而抒情，对天对地“啊”、“呀”地吟唱，正好说明无情可抒；以诗的直抒胸臆之便，信口开河，也无非说明胸间的空虚。香港有些报刊最近批评了一些内地作者对香港并不了解而直抒胸臆的咏叹，思想原因不论，这种故作抒情状的“抒情”，倒是一大糟踏“抒情”。

散文当诗写，态度可嘉；如果散文写得不成散文，就不是好事了。散文作家写散文，并非缺乏写诗的才能，而是某种感受更适合用散文表达，需要取得散文的艺术效果。

作为一个曾经写过诗，又弃诗写散文的我，倒确实是由于自己把有些本来可以化为诗的生活感受而又无能写成诗的悲剧。更不能强称诗人而强作诗。尝试写点散文，无非尝试一番自己的冒险精神。初初试笔，就已经感到困难了。文学是需要才能的。自己无能，只能陷于这种困境。对于我这个具体人来说，困境的摆脱，恐怕只得离开文学。

朋友爱戏称我为“流浪者”，是因为我总是不能安心下来，静静地呆在一处作学问，成日天南地北的跑。我在有一处说过：

……生活颠簸太多，人会疲于这种颠

簸当摇篮的催眠，诗的旋律，还总得在这
颠簸中颤绽出它的节奏与音调……

这注定我在再安逸的环境里，心灵也
象流浪者在道上颠簸，直到我死，要不，
就是人活着，诗却在我心中死去……

自知难以诗，还是追求人生的诗，于是，老
老实实记述一些亲身所遇的事，所熟悉的人，算是
给读者提供一点材料，以充散文。

今日，我“流浪”在香港，还是在没有梦的幻
美，生活得太舒适的惆怅中过日子。面对着这么复
杂的世界，当地有些报刊近日又不乏议论散文的篇
章，这时出版社从北京来信叫我为自己的散文集《
流浪者》写篇序言，于是，我也改变了原先在内地
准备写它的构思，而闲扯了以上这些话。

另外需要说明的则是：

上篇写到的有些年轻的朋友，都没有用他们的
全名、学名，只是用我们相识后习惯的称呼，但
是，也和下篇中写到的人物一样，全是真人真事；

下篇各章，全是以写作日期的先后顺序排列；

书中有些选题，是特为外国朋友和电台写的，
在翻译成外文和播出中，有的文字、标题作过一些
改动，收辑在这里，我仍然采用了原来的底稿。

1984年11月2日

目录

自序 (1)

上 编

上海记实 (1)
当年我也二十四 (7)
我的心呀，在天山 (17)
龙华，清明的花 (28)
乡音 (35)
云烟 (42)
净化 (50)
钉鞋 (64)
霏霏春雨 (72)
浪迹 (79)
《往昔的时光》自序 (88)
答《人才》 (92)
《雨窗集》前言 (96)

下 编

奥山一枝在哪里 (102)
信仰·荣誉·烦恼 (110)

目录

- | |
|--------------------|
| 严辰，一位严肃的诗人……(119) |
| 从一枝卷烟引起的思绪……(129) |
| 在电影海报前看张贤亮……(138) |
| 神鬼之间……………(153) |
| 开花的仙人掌……………(174) |
| 卞之琳印象……………(183) |
| 新春花炮的闪光……………(193) |
| 吐露港畔，巴金在微笑……(206) |

上 编

上海记实

这次冒着夜雨来到上海，立在车站的站檐下，对着万家灯火却无处可去，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从长沙上车时我就感到这趟行程难以顺利。我是挤上车用记者证补票的。站站都是上也挤下也挤，站站进站出站都无法正点。好象所有的旅客都赶到这次车来凑热闹。有时车门关了，还有提着桔筐菜箩的举着扁担敲着车门叫嚷要上车。就这么，没出几站就误点一小时。我安排在列车员休息的二号车厢，里面严禁说话，更不装喇叭，车门也锁着。肚子是知道开饭时间，等到开门，却是餐车的师傅进来休息的时候了。没饭没水，只好把人家送的点心桔子用来对付。金华一过就阴雨绵绵，愁人而忧郁的秋雨，淅淅沥沥地把车轮辗轨的声音都压下去了。到闸北车站时，天更黑了，雨更大了。乘客走光了，列车员见我望望窗外愁对行李，就把我一直送到出口处。站口，开票要车的，分了几路在雨中排成老长的队伍，有的已经站了两个小时，嚷叫为什么还捱不上号。我只能站在房沿下任雨水扑扑地往上溅，人又累又饿，单人一个，行李拖得我一步也难挪动。上车时我曾托人发报请人接站，是

报没发出？是报没收到？还是人已不在？总之，一小时过去了，也不见人来，说是等待，不如说是无望，等人的焦躁已成为苦捱时光的平静了。面前的出租车也周转得更勤，候着开票的队伍愈来愈短，站前拥挤的人群渐渐少到近乎冷落。原先的灯也关了不少，剩下几盏、光感强烈反而增添了站前凄冷的感觉。前后都是水，想蹲下来坐一回儿也不行，只有全身依在我的拐杖上。这么大的上海，每天又有多少人象我这样向着它呢？一个小伙子有点象搞治保工作的口气，走拢一问：

“你怎么啦？”

我不明白他问话的意思，雨水在他的雨衣雨帽上滚着，也望不清楚他的样子。

“残废军人？”

“曾是军人，腿可不是在战场，是在‘革’文化的‘命’时坏的！”

“‘文化革命’？那不就是战场？”口气颇象是位权威：“没地方住？去开一块钱的三轮票，我去给你找个地方！”

我早不是在等待，而是处于无望的平静，他这么一说，似乎只有听从安排的份儿。三轮是敞篷的货车。三个人坐着，那对夫妻打起伞来也给我挡点雨。感激也无言。只有伞上溅起雨水的响声。成年出差，却是头次感到飘零在外。好容易找到一家旅店，加铺也只能挤两位。他说：

“当然是人家两口子在一道，你还是给我走吧！”

他看到登记住宿时我拿出的记者证，反问一声：“你还是记者作家？”接着长吁一声：“我就是一本书呐！”

“写？肚子疼都是自己知道，那你就写吧！要是都能写书还要作家作什么？”沉默了半晌，又说：“你几时到地方的？我爹是文化革命中转业的！妈是上海的，才到上海，我是随军长大的，现在拉三轮！”

他还没有忘记我那句“曾是军人”的自白，他似乎就凭这句话与我确定了一种初识却不陌生的关系。人的感情是多微妙呵。一个年轻的孩子，一出家门就操持这个行当，真是坚韧地蹬着车在走自己人生的路啊。他生活的这么一条线，不会是追求畅销的作家热衷的题材，如果能忠于他的自我体验来写他生活的变化，也定是波澜起伏的。他既然说到自己就是一本书，那么，他这几句淡淡的话里也定有话啊！他拉我回到闸北，帮我到住宿登记处办手续，取到分配的单子给我一看就撕了：

“分在澡堂你怎么住？又有这么多行李！走！”

这时候我是无可挑拣的，可是他也说得在理。现在住正式的大饭店要掏介绍信，账房见我本人是不会认账的；深更半夜，去打扰朋友家也不好，何况他的车还规定不出闸北区。他一天的任务也完成得不理想，还得跑两趟车，就借了把伞叫我打着等他回来。好在站在货亭边，就近可以买点心吃。雨还下，夜更深，车站虽然冷清下来，却不会有关门的时候；货亭也就总有来照顾生意的。我就细看着来往的人当看世界，倒很容易打发时间。不久，我

见他困累得走不稳了，一甩他擦汗的毛巾：

“我们回去吧！”

“蹬够了？”

“再蹬一趟，太晚了，你得等到什么时候？”

“那么，我得给你补上这趟车钱！”

“钱？够吃够用就行了，心厚手黑人就完了！谁出门没个难处？一个人开一趟车钱你咋报呢！有竹杠敲我也不敲！”他父亲转业弄来户口都很费周折，蹬三轮他既不满意又为自己是用血汗换钱而安心，每月分成，总有一两百。说到娶媳妇，他几乎是糟踏自己：

“谁嫁个蹬车的？整天一身汗臭，跟我圈在一起都不是个味道！”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他是有些辛酸的故事。

在这过去的十里洋场，生活的磨炼不是使他狡猾，而是更守本分。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让自己“形象高大”，却凭这一点，使人感到可亲。劳动使劳动者淳朴。我看到他交了车轧了账，就喊了一个叫“大头”的送我到他家里去。这一下，我原先“都听他安排”的主意动摇了，首先，他要真心招待，我又怎么接受？再者，出门在这过去的洋场，深更半夜要遇到复杂的情况又怎么办呢？既怕失去警惕，也没有理由把人想得很坏。又是雨又是风，在看不到行人的街上，我要不是坐在车上跟他走又怎么走呢？雨往脸上扫，我缩紧了脖子，有点心不在焉地听他与“大头”用上海话在议论每月的收入

开支。大头又在怨找老婆花了多少多少钱，其实也是洋洋得意地讲自己的排场，讲自己会赚钱，上个月就苦到四百来块钱。大头劝他趁自己有力气时多捞点钱，为自己的生活打好基础，这是最现实的。而且，大头想到他为我这么折腾，一定也捞到不少的好处。当他分辨自己一分钱也没要时，我不得不表示我听懂了他们的对话，并证明道：

“他不仅不问我要，我给他他都不要！”

大头转过身望着我们“哦”了一声，大家就沉默了。很久之后，大头不知道是真有感触还是说风凉话：

“还是活雷锋嘛！”

“什么雷锋嘛！”他几乎大声地叫起来了。不知是怕沾污了雷锋，还是听大头说得不是味，总之是不爱听。为扬名作好事者自然有，作人本分才踏实的更不能少。我们的孩子，怨参加那场动乱是受了生活的欺骗，也就要欺骗生活，在狂乱的报复中，另一种人的本分也就会显得可贵。如果这就是英雄，英雄也不值钱。不论他该算个什么人物，该用什么命题提高这种品质的意义。我们相处几小时，就感到真有缘分了。也许父母给过他好的影响，才能这么接受生活对他的教育；也许是生活太严酷了，教育他也教育了他父母。他对我高喊一声：

我还以为他要“你也到家了，我也到家了！”我把他的家也当自己的家。原来他家楼下，居委会

就在地下室办了我在那晚看过几处的那种“合作旅社”。他给搬好行李，说服了居委会的“阿姨”，给加个铺才走。我躺下了，他轻轻走到床边，看到我没闭眼才说：

“我爸睡了，不然我喊他下楼来看看。我看你证件上是跟他同年，说不定在部队还是战友——”

不知道是激动还是麻木，感情一下子好象成空白了。什么也没有说，也不记得他怎么走了。这个“随军长大”的孩子，一听我“曾是军人”会猜计与他父亲是战友，看我腿不行会想到打仗……。我们不论同团、同军、同野战军，或者任何一位与我同向一个方向前进的，不都是战友么？看来他那有点天真的猜想又是这么符合实际啊！

第二天，我到朋友家去，请接站的电报也才送了进去。我们只好相对而笑了。他也为此一再向我道歉。比起他给我安排有空调、地毯、彩电、电话、卫生间的房子，那个地下室是不能比的。阴暗、潮湿还嘈杂，既有人开收音机到半夜，也有半夜就闹着起来去赶车的。厕所马桶的气味使人感到床铺就在马桶边。加上服务员一再提醒我“小心财物”，也就整夜难以合眼。我想过市政建设哪天才能解决好流动人口的食宿问题，更多想到战友的儿子——年轻的待业青年。不论由于什么原因，我得感激这封迟收的电报，使我昨夜过得更温暖，对上海的印象更丰富，更新了。实记在此，以备忘。

1982年11月12日上海

当年我也二十四

这几天老在想着晓军这孩子，自己一时都难以说清，这是为了什么。我是按照约定的车次去接他的，站上人走完了，也没见他。月台外，大雪纷纷。踏雪而行，不知感到雪的湿润和温暖，还是挡不住袭到心底的寒意，心绪更是难以平静。

说他是孩子，也已经二十四了。我就听过一位母亲对她孩子说：“二十四了，不小了，你爸这年纪，都给人抓拿当‘右派’了！”过去，看到西方议会斗争的某些报导，从上面“右派”一词，就联想到头微肚腆，虎视眈眈，狡诈阴毒的政客，可是这顶大帽子当年也在我二十四岁时给戴上，有人觉得还顶合适的。记得当时一位同龄的朋友看到单位包办选举时讲：“圈好了名字叫划道道，还叫什么民主选举？”人家就吼了起来：“你想在选举中搞‘自由化’？要民主不要集中？”“要集中也不是不要民主，我是对今天这件具体事有意见，你跟我扯到哪里去了？我真不懂！”“你装什么傻？不懂？二十好几了，又不是孩子！”我那时也是二十好几，人一吼，都吓晕了。二十好几的人，看来是什么都得懂，而今我年已半百了，有的该懂的还是没懂。所

以，看到那孩子，我也知道他二十四了，不小了，可是从我今天这年纪看，他反而更像个孩子。

我把他的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熟人看到后就问：

“这是谁？”

“我女婿！”

“哈哈哈哈，”这同志笑得一直到捂着肚子喊痛了：“你真会开‘国际玩笑’，女儿都没有，哪来女婿？”过一阵，他又拿起照片看看，“是你年轻时的照片吧？怎么还怪象你呢？”

“奇怪？”

“这一象你，就更叫不得女婿了！”

是的，还就为这点长相的相象，使我俩非血统关系的陌生人被看作血亲了。

上月，我们登上班机坐在一排，可还不相识。习惯了空中旅行的人，一起飞就闭目养神吧，哪有多少话跟左右的人扯。可是飞机遇故障的事，在今天也算不得什么新闻。我们的班机，因故不能在原定的机场降落了。

一下飞机，要转机的设法转机，不进城的要解决食宿问题。于是，小县城的邮电局也就被这些人突然拥去而挤不开了。只有这孩子，身长怕就是电影戏剧里姑娘们找对象的标准规格——一米八，高大漂亮，却一脸稚气，无所事事的挤在那里凑热闹。他凑到一位在拟电文的同志跟前，象要窥视别人的秘密似的。那人不愉快地一望，楞了一下才明白过来：

“哦——咱们是坐一排的，中间隔着你哥！”

“不——”他象舞台上唱《阿克西》的维族老头似的，耸耸肩，几乎是用变了调的汉语在说：“兄弟？——不是的！”

那中间隔着的人自然是指我。我取下帽子，眼角的皱纹与疏秃的发顶，大概很能证明我们不是兄弟。

“哦——”这人有点歉意地笑着对我说：“是你孩子！”

这孩子张着口，不知感到滑稽，还是尴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看着我。

这一来，我感到有话可说了：“你不发电报、打电话？”

“我是办公事跑腿来的，还打电报挂电话找谁？公事几个小时就办完了，一住定下来，明早就得弄后天上乌鲁木齐的票，赶回去过年！弄票，你有办法吗？”

我哪有把握，只有把订好的房号告诉他，说第二天再联系。

第二天一抓起话筒，我就听出这孩子象还在发育时有点沙哑的声音：

“是671房间吗？”

“你找谁呀？”我故意问了一声。

“昨天从北京来的那位客人在吗？”

我笑了。他进房后，我侧着头问：“你找谁？”

“不找你找谁？票，有没有门路？”真是单刀直入。